



李 犁 耘

老舍在北京的足跡



老舍在北京的足跡

老舍在北京的足迹

李犁耘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老舍在北京的足迹

李 犁 耘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5号

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·1092毫米 1/32·印张4.5 字数80千字

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书号：10436·5 定价：1.60元



老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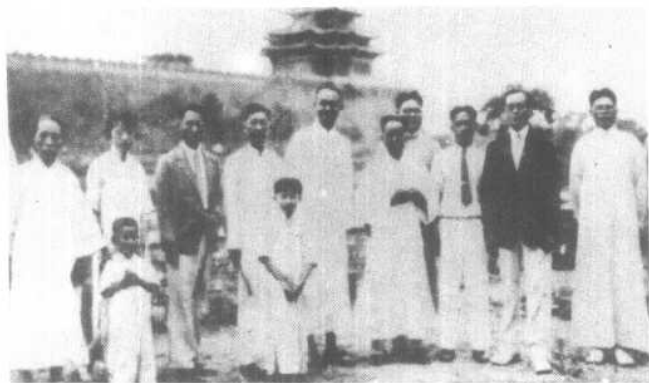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四年摄于北京“丹柿小院”

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摄于
北京东安市场



老舍与胡絮青结婚照
一九三一年七月摄于北京
西单聚贤堂





左起第五人为白添洲、第四人老舍、
第二人胡絮青（1932年夏）



老舍与夫人胡絮青在家中（1953年）

序

老舍和北京分不开。没有北京，就没有老舍。

老舍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死在北京，他的一切都属于北京。

老舍写了一辈子北京。

他笔下的北京，那二百多处真实地名，那北海，那积水潭，那小羊圈胡同；那春夏秋冬，那风，那沙；那些水果、花卉、小吃、玩艺；那些讲究、习俗……令人神往、赞叹、羡慕、眼花缭乱，令人身临其境，令人摸得着，甚至可以闻得见味儿。

他写的北京人，小人物居多，并不显赫，可是很有名。祥子、虎妞、小福子、程疯子、王掌柜、祁老爷子、大赤包……大概是北京最有名气的居民了。男女老幼几乎都晓得他们的名字，知道他们的脾气秉性。

这一切特殊的效果，都只因为老舍熟悉北京。

北京有许多老舍的足迹。

这本小书，就是老舍足迹的第一本系统的记录。我以为，它的出版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努力。

它很真实，这是我敢担保的，这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。

胡 絮 青

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于北京

目 录

老舍与北京·····	(1)
从“小羊圈”说起·····	(5)
“小羊圈”外面的天地·····	(14)
姥姥家和舒家墓地·····	(21)
老舍上过的学校·····	(27)
路,从方家胡同开始·····	(34)
老舍住过的寺庙和教堂·····	(38)
老舍同胡絮青第一次见面的地方·····	(48)
丹柿小院·····	(54)
从龙须沟到陈各庄·····	(61)
老舍办公的地方·····	(70)
太平湖西岸·····	(75)
老舍在北京活动简表·····	(82)
舒乙同志的信·····	(98)
后 记·····	(100)

老舍与北京

生活在北京而又写北京的作家是很多的。但是象老舍先生从生活到创作同北京的关系那样密切，作品又具有那样浓烈的“北京味儿”的作家，不多。写北京，写北京的劳动群众，写北京社会风俗的沿革，并且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，当首推老舍。

舒乙同志做过一个精细的统计，在老舍先生留下的二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，以北京为地理背景的有一百五十万字，占老舍全部长篇小说字数的百分之六十。他的中、短篇小说，虽然由于篇幅关系，对地理环境着笔不多，但仍然可以看出不少篇的故事是发生在北京的。解放后写的话剧，几乎全是以北京为地理背景的。因此，舒乙同志的第一个结论是：“老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北京的”。

人们公认的老舍先生的代表作有七部，即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、《四世同堂》、《正红旗下》，中短篇小说《月牙儿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，话剧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。正巧，这七部作品全是以北京为地理背景的。因此，舒乙同志的第二个结论是：“老舍作品中最精采的部分是写北京的”。

老舍先生的处女作《老张的哲学》是写北京的，他离世前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《正红旗下》也是写北京的。因此，

舒乙同志的第三个结论是：“老舍写了一辈子北京”¹。

可以说，老舍先生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用在描写北京上面了。是什么精神在支配他这样做呢？是因为在他的心中埋藏着对北京深深的爱。他说，他所爱的北京“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，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，一大块地方……它是在我的血里。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”²，“不管我在哪里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的小说的背景，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，更真实，更有感情。这是真话。”³

北京是老舍的生命之源，创作之源。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创作同北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。因此，这就产生了关于老舍与北京关系的学问，这个学问，可能北京人是感兴趣的。一般人，可能只知道有这么一位可尊敬的作家，喜欢读他的小说，也爱看他写的戏，但是对这位大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具体情况、他同北京的那种特殊关系，知道的就不多了！比如，他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出生，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去世？在哪里上过学，在哪里办过公？他的哪部作品是在哪个地方写的，哪些地方又是他的哪部作品的地理环境？……这些虽然都是老舍生活的细节、侧面，但是它对我们了解这位大作家的生平，理解他的创作，研究他的作品，不会是没有帮助的。

曹雪芹去世两百多年了，关于曹雪芹本人的生平资料存留下来的很少，这成了《红楼梦》研究者们极大的苦恼，也影响了红学的发展。如果这方面有哪怕是微小的发现，也会成为对红学研究的重大贡献。现在，一个“老舍研究热”

¹ 舒乙：《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》，《文史哲》1982年第4期。

² 《想北平》。

³ 《我热爱新北京》，北京出版社1979年初版。

正在形成，两百年后（或许根本不会那么久远），谁能说不会出现一种“老舍研究学”呢！与其让那时候的研究者因为缺乏资料而苦恼，何不现在就把老舍的资料记录下来，整理出来，有一点，记录一点；有一方面，整理一方面，给后来者创造条件呢！

我记起了我第一次到老舍故居去的情景。当我走进那座“丹柿小院”的时候，仿佛一下子同老舍先生亲近了许多。他在柿子树下为花草松土施肥的闲适，在会客室同客人谈话的幽默，趴在书桌上挥汗疾书的勤奋……都活现在眼前、耳边。后来，我把这种感觉同一个朋友说起，他知道我没有见过老舍，便解释说，你从书本上了解的老舍，同眼前景物相互印证的时候，便“触景生情”，生出了许多感触、想象和新的理解，于是，你对老舍的了解就具体化、形象化了。经他这么一点拨，我似有所悟，这也许就是人们喜欢参观、游览、看名人手迹和遗物的原因吧！如果把老舍先生在北京居住过、学习过、工作过的地方记述下来，不仅给后来者留下研究资料，也让同代人知道老舍先生的更多情况，这对于促进“老舍研究学”的发展，兴许是有作用的。从这时起，我就想寻找老舍先生在北京的足迹了！

有一次，我和舒乙同志谈到这件事。他说，父亲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就有十处，工作和接触过的地方更多，这些地方不少被写进了他的作品。无论是四合院、小胡同、城门洞，还是店铺、公园、寺庙，在他的作品里无不融注着深情，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。这些地方，现在有的已被拆除，有的正准备拆除，很需要系统地把它们拍照下来，否则，将是莫大的憾事！……这件事，后来得到了北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，社里派了一名摄影师和一部专用汽车协助工作。我们草拟了

一个“老舍在北京的足迹拍照计划”，又邀请研究老舍的王行之同志参加，舒乙同志担任指挥，加上摄影师张肇基同志，一行四人，便开始了这一有意义的追寻老舍在北京的足迹的旅行。

国庆节过后，风和日丽，正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。香山的红叶初露，祥子牵着骆驼曾经走过的西山清晰可辨。城内的公园和街道两旁的树木葱郁，国庆节在大街小巷摆的盆花还没有收，整个北京成了个大花园。这真是拍照的好时节！

约莫经过了半个月的走街串巷、寻村问舍，顺利完成了原定的拍照计划。还好，已经拆除的房屋只有很少几处，有的虽拆除了，但我们从有心人那里弄到了拆除前的照片。有的，我们刚拍照没过几天，就拆除了！要说，我们也真算幸运的。这些照片，拍下的是老舍在北京生活画面上许许多多的“点”，如果用时间的“线”把它们连缀起来，就看出了老舍走的是怎样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！

从“小羊圈”说起

《四世同堂》电视连续剧播出之后，北京人轰动了。人们问，北京真的有那条小羊圈胡同吗？它在哪里？回答是，有。北京确实有这条小胡同，不过它现在改了名儿，叫小杨家胡同。它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胡同，在地图上 是找不到的。要是你照着“新街口附近”这个大范围来找的话，恐怕至少要费你半天工夫。我们要不是舒乙同志（他是做过周密调查研究的）带着，没准儿从胡同口走过去也不会注意。

汽车停在护国寺街的人民剧场对过，下车后出护国寺街西口，向北走不远，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，写着“小杨家胡同”的牌子挂在北山墙上。要是由北往南来，它在你的背后；由南往北去呢，又有一根老粗的电线杆子挡着，很不容易看到。倒是胡同口墙头上的“闻香来饭馆”几个大字惹人注目，瞧见了这几个字，小杨家胡同就算找到了。我们站在胡同口往里一看，半截小巷，只有三块方砖那么宽。进胡同走不了十几米，迎面被一间房子的后墙挡住。走到墙根，胡同又向北折了弯儿，再走，眼前才豁然开朗，“小杨家”曲里拐弯儿地伸展开去，把我们引向胡同的深处。

一群玩耍的孩子被摄影师的相机吸引住了，其中一个小淘气儿摸摸相机，问：“是拍八号院吧？”他似乎并不需要

回答,接着介绍:“常有人来拍,前几天日本人还来拍了。那,”他指着远远站着的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姑娘说,“她就住在八号院”。姑娘听了,不知怎么回事,轻轻地问:“你们是哪儿的?”从我们的回答中,她知道了舒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时,微笑了,有礼貌的告诉我们说:“这里常来人照相,还有外国人。院里挺乱的,又没有人招待。你们看,我把大门锁上了。”她一边说着,一边打开门请我们进去。

当初,《四世同堂》中祁家大院的门牌号是五号,现在改成了八号。我站在八号院门口,用《四世同堂》中祁家大院的格局来比较这里的变化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,祁家的花墙子门楼不知道什么时候坍塌了,现在新砌成了一座门垛子,方方的,平平的,窝在隔壁高大的山墙下面。砌垛子的砖外面没有抹灰,看得出都是新烧的,可以推测,原来的门楼坍塌没有多长时间。原来那座比较讲究的影壁被拆除了。祁老人用破缸装满石头顶街门的办法,自然是早已淘汰,现在大门上安了撞锁。不过,总感到这座新修的方形门垛子,和新漆的一扇红门,同整个大院的格局(虽然老舍先生说过“它没有格局”)和色调,显得不那么协调。

老舍先生描写这个大院的作品,除了《四世同堂》,还有自传体小说《正红旗下》,而写得最早、描写最详细的则是在自传体小说《小人物自述》中。^① 这篇小说描写这个院子的门楼,同整个院子的格局似乎较为协调:“街门门楼是用瓦摆成了一些古钱的,到我能记事的时候,可是,那些古钱已然都歪七扭八的,在钱眼里探出些不十分绿的草叶来。……两扇门的破旧是不易形容得恰到好处的;大概的说,它们是

① 这篇小说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出版的《方舟》第39期上,新近才被人发现。

瘦透玲珑，象画中的石头那么处处有孔有缝。自然这一点也无碍乎我们天天晚上把它们关好，扣上镣吊儿，钎好插关，并且依上一块大石头；我们的门的观念反正是齐全的……左右门垛上的青灰并没有完全脱落，我确乎记得有那么两三块，象石板似的由水夫画满了鸡爪形的记号，好到月底与我们算帐。……影壁是值不得一提的，它终年的老塌倒半截；渐渐地，它的砖也都被拾去另有任用，于是它也就安于矮短，到秋天还长出一两条瓜蔓儿来，象故意要率俏似的。”由这一段描写可以看出，《四世同堂》中祁老人的门楼多少有点因袭前规：“花墙子门楼”比起“门楼是用瓦摆成了一些古钱”，只是说法上笼统一些；“用破缸装满石头顶街门”比在门上“倚上一块大石头”，在方法上则稍微麻烦一点，但祁老人可能认为会更稳妥一些；在门上画鸡爪记帐，同在门垛上画鸡爪记帐，似乎没有大的区别；只是影壁，祁老人大概是经过了修葺，不是“老塌倒半截”了。

我们站在门口看院子，是北边一溜房子和南边一溜房子挤成的小夹道，大约有三至四块方砖那么宽，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中的院子那是艺术夸张了。一进大门，南房前面长着一棵枣树，虽然粗壮，但树身子却打了两个弯儿，才艰难地从这个小空间探出头，在房顶上撑起了巨大的伞盖，把整个院子罩起来了。老舍在《小人物自述》里是这样描写这个院子的：“这是所敞亮而没有样子的房子，院子东西长，南北窄，地势很洼，每逢下了大雨，院中便积满了水，很象一条运河。北房三间，有两个门；我们住两间，姑母住一间，各走各的门。东屋两间，租给关二大妈和她的学油漆匠的儿子住着……东屋的背后是小小的厕所……因为院子南北里窄，所以两间南房是在西尽头，北房的西垛子对着南房的东垛子，于是两

间的垛子形成了一座关口似的”。七年之后，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中又写到了这个院子。他是这样描写的：“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，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；假若相对起来，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，而颇象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。南房两间，因此，是紧靠着街门，而北房五间面对着南院墙。两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；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，是厕所。……院中是一壅土地，没有甬路；每逢雨季，院中的存水就能有一尺多深，出入都需打赤脚。”两相比较，除了后者说的是“北房五间”，其余基本相同。也许后来在三间北房两边加了耳房，也说不定。或者《小人物自述》中在这一点上是属于虚构了。现在，北房的确是五间了，而且空地上又有了新的建筑，院子的老格局被打破了：在“北房五间面对着的南院墙”根儿，盖起了几间简易平顶房，和原来的两间南房起齐。老舍先生原来想象的“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，而颇象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”变成了现实。不仅如此，在三间正房的东头一间（这应该是祁老人的长孙瑞宣夫妇的卧室）前面，还用油毡之类的自备材料盖起了一间厨房，又颇象轮船上房舱中间走道上放了一个茶炉！

院里的枣树，在老舍先生的几部作品里都提到了，说法略有出入：《小人物自述》中是这样写的：“院里一共有三棵树：南屋外与北屋前是两株枣树，南墙根是一株杏树。两株枣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，当夏初开花的时候，满院都是香的，甜梭梭的那么香。……那棵杏树简直提不得。我不记得它结过杏子，而永远看见它满身都是黑红的小包包，藏着一些什么虫儿。它的叶子永远卷卷着，多毛的绿虫一躬一躬的来往，教谁都害怕。”《四世同堂》中没有提这棵杏树，对于枣树，是这样写的：“在南房前面，他还种了两株枣树，一株结的是大